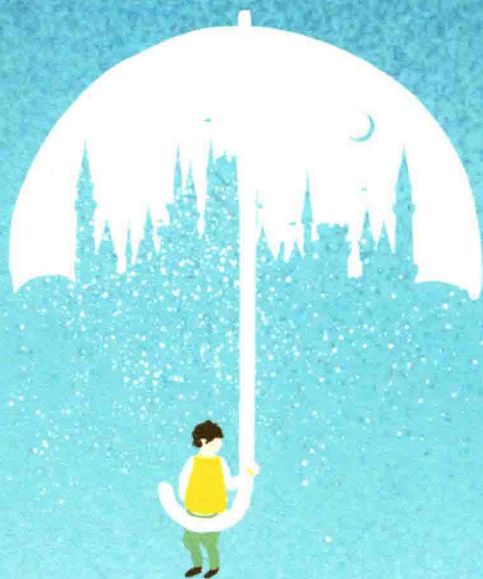


【美】罗恩·萨斯坎德 —— 著
肖毛 —— 译



躲在迪士尼里的童年

关于爱、勇气和孤独症的
真实故事

迪士尼的声影
在漫长的黑夜与静谧中化为精灵
带你飞出孤独的国度

● 海豚出版发行集团 | 北京海豚出版社



躲在迪士尼里的童年

关于爱、勇气和孤独症的真实故事

LIFE, ANIMATED

A STORY OF SIDEKICKS, HEROES, AND AUTISM

[美] 罗恩·萨斯坎德 著

肖毛 译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鹭江出版社
LUJIANG PUBLISHING HOUSE

2016年·厦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躲在迪士尼里的童年:关于爱、勇气和孤独症的真实故事/(美)罗恩·萨斯坎德著;肖毛译. — 厦门:鹭江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459-1192-3

I. ①躲… II. ①罗… ②肖… III. ①纪实文学—美国—现代
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13823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3-2016-032号

Copyright © 2014 Ron Suskind

Life, Animated: A Story of Sidekicks, Heroes, and Autism

was published in 2014 by Kingswell

New York & Los Angeles

Simplified Chinese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DUO ZAI DISHINI LI DE TONGNIAN: GUANYU AI YONGQI HE GUDUZHENG
DE ZHENSHI GUSHI

躲在迪士尼里的童年:关于爱、勇气和孤独症的真实故事

【美】罗恩·萨斯坎德 著

肖毛 译

出版发行: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鹭江出版社

地址:厦门市湖明路22号

邮政编码:361004

印刷:北京睿特印刷厂大兴一分厂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星光工业开发区西红门福伟路
四条十号

邮政编码:102600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插页:2

印张:25.5

字数:333千字

版次: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459-1192-3

定价:48.00元

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就像您即将从本书中了解的那样，在我儿子欧文的个性与情感的成长过程中，迪士尼动画片中的对白与歌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要感谢沃尔特·迪士尼公司，他们同意不干涉本书的内容，即使文中包含对于他们核心业务的评估。该公司已经明智地信守了这个承诺。

在这种情况下，本书独立于迪士尼，也是符合双方利益的，迪士尼不以任何方式担保其动画片可用于解决自闭症方面的问题。

下面讲述的是一个家庭过去二十年的经历，以及我们的发现。

目 录

1	第一章 / 逆生长
33	第二章 / 碰壁
57	第三章 / 人戏
85	第四章 / 抢椅子
103	第五章 / 伙伴的守护人
131	第六章 / 旅途之歌
173	第七章 / 奇计妙法
205	第八章 / 不幸之幸

239	第九章 / 完全是好事
267	第十章 / 电影大仙
301	第十一章 / 做出自己的选择
331	第十二章 / 激活的生命
363	伙伴们
370	鸣谢
375	附录
393	译后记

人，他不仅没有因为自己的成功而沾沾自喜，反而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他意识到，自己必须不断地学习和成长，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他开始阅读大量的书籍，参加各种培训课程，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同时，他还注重培养自己的领导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带领团队共同完成一个个艰巨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学会了如何面对挫折和失败，如何从失败中汲取教训，如何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梦想。他的成长经历充满了艰辛和挑战，但也正是这些经历让他变得更加成熟和坚强。他深知，只有不断地学习和成长，才能在瞬息万变的时代中保持竞争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第一章

逆生长

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我们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科技的飞速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使得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在这一切的背后，我们是否真的在成长？是否真的在进步？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逆生长，这个看似矛盾的概念，却在现实生活中悄然发生。它指的是一个人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能够保持冷静和理智，不被眼前的利益所迷惑，而是选择退一步海阔天空。这种逆生长的过程，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换来的却是更长远的利益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逆生长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具备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只有当我们坚信自己的目标，并为之付出努力时，才能最终实现自己的梦想。同时，我们还需要具备开放的心态和包容的精神。在逆生长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只有当我们能够包容和理解他人时，才能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为逆生长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逆生长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逃避，而是一种智慧的选择。它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被眼前的喧嚣所迷惑。通过逆生长，我们可以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找到真正的自我，实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逆生长，是一种成长，更是一种智慧。让我们在逆生长的过程中，不断成长，不断进步，最终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有一盘令我纠结的录像带。

它拍摄了一个学步的男孩拿着尼尔夫牌玩具宝剑跑过落叶的情景。带子的拍摄日期是1993年10月。男孩大约两岁半，跑得像同龄的孩子一样，莽撞前冲、摇摇晃晃，但他马上就不会再这么跑了。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在影像丰富的20世纪末，我们知道事物看起来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也能够根据活动的画面做出各种推断，而这些推断通常都是正确的。他是个天真的男孩，头发打着卷儿，穿着绿色的灯芯绒裤子和色彩鲜明的羽绒服。树木的种类和地形暗示那是美国的东北部。院子里铺满落叶，前面的房子虽然小，但那架精美崭新的秋千却反映了一对小夫妻的良苦用心。一个大孩子般的黑发男人哈哈地笑着，手拿小树枝追赶着男孩。他追着追着就跪在落叶之中，一边催促男孩转过身，一边笑眯眯地准备战斗。双“剑”相交的时候，那个男人说：“他不是男孩，他是会飞的魔鬼！”这是迪士尼动画片《彼得·潘》里的胡克船长的台词，他模仿得还真像那么回事呢。

那个男人和男孩正在背诵一部1953年拍摄的动画片的对白，这表明了盒式磁带录像机的普及。录像机标志着当时声像电子记录技术迈出的最新一步，首次进行录音的人则是一个世纪以前的托马斯·爱迪生。要是懒得去电影院，你可以在家里看电影，播放多少遍都用不着掏钱。他们就是这么办的。当时迪士尼开始发行《小飞象》《丛林之书》和《彼得·潘》等经典动画片的盒式录像带，那些出生于1946年至1965年的生育高峰期的人一旦做了父母，就可

以把从小爱看的动画片买回家，与孩子们分享。这是个了不起的商机，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出现了这样一盘录像带：记录着两个人背诵动画片对白的情景。

现在来想一想这些细节的普遍意义吧。毕竟，这段记录了父与子玩耍场景的录像承载着大量隐藏的情感：男孩每走一步都在渐渐成长为他的丰富想象中的英雄；至于从内心深处隐隐知道儿子终将长大并代替自己的父亲，则在这段时间里考虑着种种富有创造性的死法。男孩刺出最厉害也是最漂亮的一剑之后，战斗轻松地结束了。那个男人倒在地上，就像发出碎裂声的枯叶那样“死”掉了，但下一秒却把那个咯咯笑的孩子举到了头顶。



我就是这一小段平常但美好的录像里面的父亲，那个男孩是我的儿子。我已经把这段录像看了一百次，我的妻子也是如此，一直看到我们再也不忍心去看为止。

这盘录像带无情而且永远地记录着他最后的影像。

一个月以后，那个男孩消失了。



在我们结婚之前，她叫柯妮丽娅·肯尼迪，来自康涅狄格州的一个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大家庭，她现在的姓氏是萨斯坎德。我是她的丈夫罗恩，是来自特拉华州的犹太人。我们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当时五岁了，名叫沃尔特，他的名字取自在我幼年时去世的父亲。我们的小儿子叫欧文，也就是拿着泡沫塑料宝剑的那个。那是我们第一所房子，连同那个铺满落叶的后院一起，坐落于马萨诸塞州的戴达姆。我已经在《华尔街日报》的波士顿分社干了三年，我们打算去华盛顿特区，我打算为那里的报纸报道国事。前面提到的那盘录像带就

是在搬家车到来的前一天拍摄的，当时我们都还安坐在“正常”的土地上。我根本没有对“正常”这个词寻思得太多，“正常”的定义不言而喻，与其说我们根据“正常”是什么来界定其含义，不如说根据“正常”不是什么来界定其含义。这就像一个圈，圈外的一切界定了其范畴。



我们刚刚在华盛顿住了几个星期，柯妮丽娅就发现了欧文的反常。她整天守着他，每天都是如此。

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欧文心烦意乱。他大哭大闹，到处乱跑，停一会儿，接着哭喊。上气不接下气停下来时，他似乎只是盯着前方。

不闹的时候，他就用探究的目光看着柯妮丽娅。她用双手捧住他那汗湿的红通通的小脸，问他出了什么事，但他似乎无法告诉她。虽然向来不如爱说话的哥哥那样健谈，但欧文也挺能说的——他会说几百个单词呢，其中近三成是常用的，他时刻准备用这些常用词说出自己的需要或者爱意，甚至讲个小笑话或者故事。

我们搬进了乔治城租来的房子里，杂务缠身：打包的行李要解开、为沃尔特找新学校、我在大而嘈杂的新闻处开始新工作。所以，我们没有注意到欧文已经不怎么讲话了，直到他只能说出几个词的时候。搬家车是在11月出发的，一个月以后，除了“果汁”二字，欧文什么都不会说了。

有时，他甚至不愿意去喝装在鸭嘴杯里面的果汁。他差不多在一年以前就学会使用“大男孩的杯子”了，但他在乔治城时用其他杯子都会洒，好像不会用杯子喝水了似的。他确实不会了。他老是打转转，走路歪歪斜斜的。于是，坐在滚轮椅上的柯妮丽娅总是尽量拉住他，同时在脑子里迅速检索着过去几个

月发生的事情。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她却没有任何意识到呢？

这就像回忆绑架案的各种线索。去年8月，我们到南安普敦游玩了一次，那天他动不动就哭，怎么也哄不好，以前他可不是个爱哭的孩子——从来都没有哭过呢。接着是10月底，搬家车过来装车的那天，当天替我们照顾两个孩子的好朋友开车把他们送回来的时候说，欧文一直在睡觉。他是会不时地打盹儿，但怎么能睡上半天呢？柯妮丽娅打开一个箱子的时候，发现一盘搬家那天拍摄的录像带。当时太阳就要落了，沃尔特被领到我们半空的房子里转悠了一圈。他挺开心，去华盛顿就等于出一趟远门呢。他的金鱼阿蒂和泰勒——它们的名字来自跟他最要好的两个小伙伴——已经装在密封的盆子里，为旅行做好了准备。“我的鱼也要跟咱们一块儿走啦！”他说。接着，欧文在摄像机镜头前面一闪而过，他懒洋洋地轻声说：“这是我的小床和我所有的东西。”

她又在那个箱子里翻出来一盘录像带——“彼得·潘”挥剑战斗记。那天晚上，她和我一起看了这盘录像带，可在那里根本看不出什么问题。瞧他跑得有多起劲，说话又是多么流利呀。我们把录像带倒回去，重看一遍，然后再看一遍，试图从中寻找线索。

12月中旬的一天，柯妮丽娅跟欧文一起躺在他的下铺，沃尔特则在上铺熟睡着。加热灯照亮的小鱼缸在书架上嗡嗡作响，阿蒂和泰勒在水泡之间默默地游动着。当时是凌晨三点。欧文正在来回翻身，咕哝着毫无意义的话。柯妮丽娅尽可能地抱紧他，好让他安静下来。在黑夜的绝望中，她开始祈祷，流着眼泪对自己的孩子耳语，希望天主能够听见：“请帮助我们吧。不管发生任何事，我爱你至深，我因你而爱。我会一直牵着你渡过这一切。”



眼看着就要过节了——在这个互相馈赠的节日里，人们有好多礼物要买，

华盛顿也因各种各样的活动而热闹起来。

这应该是满怀希望的时候。表面上看来，我们酝酿多年的生活计划完全实现了。大学毕业以后，我和柯妮丽娅在组织一次竞选活动时变成了朋友。她坐在我的桌子上，看了看我要向法学院提交的申请书，然后告诉我，我看起来不太像想去法学院——我后来的确没有去——但这篇申请书写得挺上档次，我应该考虑去当作家。她那时已经是作家了，还是个新秀呢，而我立刻就喜欢上了这个建议。在四十六岁那年死于癌症之前，父亲给我和我哥哥写过一封信，恳求我们用自己的生命“做点儿值得做的事”。新闻工作似乎挺合适的，因为你能跟官方对着干，探寻点滴的真相，还能培养读者群。我们的候选人输掉了竞选，我们俩却比翼双飞了。她在纽约的《人民》杂志社谋得一份记者工作，我进了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两年以后去《纽约时报》当新闻事务员，那时她已经高升为纽约的一家杂志的主编了。给《（佛罗里达州）圣彼得斯堡时报》做了一年半的新闻报道以后，我们在那个州喜结连理。柯妮丽娅跟着我去波士顿的一家小经济杂志社当编辑，1990年在与波士顿旧南会议厅仅有一箭之遥的《华尔街日报》新英格兰分社谋得一个职位。为了遵从我那在布鲁克林长大的无比自豪的母亲大人的指示，我从几乎不会说话时起就一直在编故事。在父亲去世以后的那段难熬的岁月里，我甚至把编故事变成了持之以恒的生活习惯。但我还在年复一年地学着给风格独特的报纸头版编写篇幅更长的故事，我被调到华盛顿就是为了专门干这个——这可是个理想的工作呢。

所以，我们到了晚上就尽量只谈一切具有正能量的事情——新朋友、为我们租来的三层高的联邦风格排屋买来的旧家具、我们日后说不定会买房子的社区。有一次，柯妮丽娅却不情愿地提到了她当天的经历，即欧文干了什么叫人担心的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说，接着又试图找出一些可信的解释：欧文遇到了什么麻烦事，有可能是肚子疼，甚至有可能是变得有点耳背了——我

们会把事情彻底搞明白的。

“小孩子怎么会越大越耳背呢？除非他正在逆生长。”



儿科医生要求单独看一看我们的儿子。他吩咐我们坐在候诊室里，我们用不着在场。他想知道欧文是怎么独自与陌生人交流的。因为孩子们都是容易相信别人的小家伙，他们往往会对陌生人进行观察；他们很好奇；他们喜欢吸收信息，就跟小小的真空吸尘器似的；他们总是用眼睛看着你，表达自己的看法。至少这是他们应该有的反应。

几分钟以后，医生吩咐我们进入诊室。欧文什么反应都没有。我们说，是呀，我们知道，要不我们干吗到这儿来呢。柯妮丽娅三言两语地描述了一番她看到的情况，以及我们有多么揪心，我们的生活有多么乱套。

医生听她说完。“要是家族状况导致了如此严重的反常，”他说，“那么这确实是个问题。”要是儿科医生说不准他们看到的状况，尤其是跟小孩子有关的，他们所谓的“母亲般的关怀”就不过是空谈。

他说他要采集血样，以便进行两项基因测试。第一项测试是为了检查有没有脆性 X 染色体综合征（我们后来才搞明白，这是一种神经系统的疾病，具有可以追查的遗传标记与可怕后果），第二项测试是为了检查有没有家族黑蒙性白痴病。我知道后一种病是什么：这是在婴儿期引起精神和身体渐渐衰败的疾病，患者四岁时通常会因此致死。这种病在东欧裔的犹太人中间特别多。所以，如果欧文有这个病，那就是由我这儿来的了。在希伯来学校里，你会听说这种病，连同纳粹分子对于犹太人的大屠杀。随后他介绍我们去马里兰州罗克维尔的一所中心，那里也许会帮上更多的忙。

2月的一天，我们进入雷金纳德·S. 劳里婴幼儿中心，坐在一间截然不同

的候诊室里。与候诊室相连的是一间可以通过单向镜观察的游戏室。里面布置了大块的彩色积木、秋千，还有给孩子玩的垫子……孩子处于被观察的状态下。我们被领进一间诊室，有个黑发女人等在那里，她个子挺高，表情挺酷。她跟欧文打招呼，柯妮丽娅则尽可能紧地抓住他的手。在她的诊室里，她跟我们说了更多好玩的东西。欧文毫不动心。几分钟以后，她吩咐他在那个长长的走廊里行走，从我这边走向柯妮丽娅。让他走吧，我真想说：“走得又快又直，就像在戴达姆那样，哪怕就这一次呢。”他没有办到。他摆动着胳膊，转来转去，磕磕绊绊地沿着之字形前进，好像在闭着眼睛奔跑。柯妮丽娅把他抱起来以后，我们返回了那个女人的诊室。“看起来他有广泛性发育障碍症，这会影
响大多数正常发育部位，”她说，“别的不说，单从他走路的样子来看，这个症状就很明显了。”她继续用冷淡而又超然的语气往下讲，几乎不去看坐在地板上摆弄手指的欧文。那时我们其实心不在此。我和柯妮丽娅都神思不属，好像浮在半空中俯瞰着那对坐在椅子上吓得目瞪口呆的小两口不时地点头，还有他们身边的孩子专心致志地研究双手的情景。这就是医生说“自闭症”这个词的时候我不太相信她的缘故。

不相信是一件力量强大的武器。多年以后，一位好友的父亲——他是精神科的老医生——向我提出了睿智的忠告：“重视不相信的力量吧。它的存在是有用处的，它是应对不能面对的问题的方式。”我都三十四岁了，却从没有重视过不相信的力量，甚至都没有见识过。

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和柯妮丽娅默默地坐在那里，欧文在我们身后的儿童安全座椅上拼命地扭动着。那个女人肯定说错了。我们当时对自闭症的了解和多数人没什么两样。凡是美国人都看过《雨人》，我们也不例外。我们的儿子可不是达斯汀·霍夫曼扮演的雷蒙·巴比特。根本不可能。

一个月以后，我们找到了新医生，他是一位前程远大的青年儿科医生，在

生意兴隆的贝塞斯达诊所工作，看起来酷似柯妮丽娅相识多年的高中校友——我在大学里跟这个人挺亲近，柯妮丽娅和我就是经他介绍才认识的。这让我感觉好多了。

艾伦·罗森布拉特医生把欧文抱到大腿上，和蔼可亲地说：“嘿，小家伙。”这一次，欧文把脸转了过来。他们做了几个动作——医生把自己的手挪过去，接触他的手指，跟他一起观察。随后，他们一起蹲在地毯上。欧文似乎并不紧张。他们用积木搭建小房子，罗森布拉特开始搭第一座，想看看欧文会不会跟着搭。

他没有。他们之间没有多少交流。欧文站起来，开始溜达。罗森布拉特喊他的名字。接着欧文就爬到椅子底下，回头扫了医生一眼，露出一闪即逝的“过来抓我呀”的表情，引诱对方追赶。罗森布拉特在写字夹板上匆匆地写了几个字。

医生在椅子上坐下来，说：“恐怕欧文有我们如今所说的广泛性发育障碍症，或者说广发症，但他还有一些‘未另行说明’的行为。”这句话的意思是，欧文有些“类似自闭症患者的行为”，但也有其他行为，比如做出“过来跟我玩”之类的表情，而这不符合如今对于典型的自闭症的定义。

他为欧文制订了一个生活计划，认为我们应该立刻实行。我们要给他进行言语强化治疗、作业治疗和游戏治疗，还要马上寻找将在秋天开学的合适的学校，而他对这个计划有些建议。“早期干预，是至关重要的。”他又补充说：“要是孩子有宗教信仰或者常去某些宗教团体，往往会恢复得更好一些。”这个补充叫我们不寒而栗。那个大灾难就要降临了，但柯妮丽娅很快就会从中汲取力量的，她可是个从小受过熏陶的天主教徒呢。

欧文没有被贴上自闭症患者的标签，这让人松了一口气。同样使人放心的是，罗森布拉特把欧文的问题定性为“滞后”。这些术语给了我们多么含蓄

的保护，我们是以后才更多地领会到这一点的。他的话产生的重大影响是：我们没有从诊室狂奔而出，也没有在开车回家的路上觉得就像刚刚被切掉了四肢似的。

4月的一天，与罗森布拉特边聊边走向停车场的时候，我们得到一笔用来构建防御体系的红利。我们提到一个在波士顿认识的高明的儿科医生，他是哈佛大学的医生，名叫鲍勃·迈克尔斯。罗森布拉特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匹兹堡人？对，我们激动地说，他是在匹兹堡长大的。“我不认识鲍勃·迈克尔斯？我小时候就是在他父亲那里看病的，他是个了不起的人。要不是因为他，我多半还不会成为儿科医生呢！”

我们一到家就给哈佛的迈克尔斯医生打电话，告诉他这个惊人的巧合，接着又绝非顺便地解释说，自从离开马萨诸塞州以后，我们一直在带着欧文忙活什么。他让我们等一下，好去拿欧文的病例。他翻阅了一会儿病例，尽管几乎用不着去翻。“去年夏天我刚刚为他检查过，他什么毛病都没有。我想象不出他怎么会有这个问题。”

我们也想象不出。是的，他出了什么毛病，但就连医生也搞不清是什么呢。他是“非典型的”——罗森布拉特用过这个词——他的问题是各种行为的滞后。这些是可以矫正的。我们在那天晚上睡得稍稍安稳了。我们要用每个醒来的时刻拯救这个孩子，让他恢复，让他再生！我们真是异想天开。



第二天早上，柯妮丽娅牵着欧文的手，陪着沃尔特离开我们在乔治城的房子，顺着街道往下走了七个街区，前往海德小学。沃尔特在学校过得挺滋润，只是有点儿纪律散漫的问题——学校第一次组织早集合的时候，他用吹口琴的办法宣布自己到场。他喜欢上学、交朋友、做游戏、学知识，也喜欢长大。那

天把沃尔特送到学校以后，柯妮丽娅领着欧文去跟几位孩子家长会面。与周围的其他几所华盛顿西北部的小学相比，海德小学也是蛮拼的，不过它正在奋起直追——学校不久就要搞一次海德春季义卖会，她们就是准备在那天早晨的咖啡聚会上商讨这个活动的。义卖会可能而且应该为学校筹集大量资金，身为义卖会联合会长的柯妮丽娅一直在忙着邀请捐款人和组织捐赠物品之类的事情。

这一切使得两周以后的那一天——也就是5月初的一个星期六——变成了搬到新社区以来的大日子。那天早上的晚些时候，学校旁边栅栏围着的大操场里渐渐客满了，娱乐设施管理员忙着给跳跳床充气。这情景正像我们希望在华盛顿看到的，其实也是任何人都想要的——有成群的快乐武士相伴，建造了一个被玩具和食物围绕的小世界，大批家长和孩子聚集其中，为崇高的事业发出欢呼。

我们当然在那天为欧文制订了非常谨慎的计划，好让他可以跟我们一起参加活动。通往操场的门只有一道，看门的家长志愿者认识他，时刻提防着他悄悄溜出去。这甚至都不算个问题，因为我或者柯妮丽娅将会时刻与他同在。我们陪伴了他好几个钟头，狂热的义卖会则潮水涨落般地持续着：要加冰块吗？谁知道电源开关在哪儿？我们的热狗卖光了！

确切的时刻实在难以说准。一般都是孩子父亲的错。孩子母亲的体内大概有一种固化的神经器官，可以立刻查出孩子的坐标，它的形成历史大约可以追溯到创世大爆炸时期。情况本来挺正常的，直到我在下午松开他的手，把剩下的一小半热狗——欧文午饭吃了一大半——塞进嘴巴里，又拿起放在地上的可口可乐罐。等到我扭过头，左边一英尺远的地方——那片有秋千的石子路上——变得空空如也，而他刚才还在那里站着。

孩子父亲的体内也有这种器官，但启动电路不一样。第一条规则：不要慌。持续而又迅速地扫描周围：90度、180度、270度、360度。

接着我就慌了神，我先是慢跑到门口，向看门的一个孩子爸爸打听：“您